

唐代福建的教育与科举活动

刘 海 峰

唐代是福建经济和文化开发的重要时期。福建的人文教育活动也在唐代出现转折,从唐中叶以后进入持续发展阶段,为宋以后福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本文从辨正建中(公元780年)以前“闽人未知学”的旧说入手,追溯李椅福州兴学、陈元光父子漳州办学活动,进而分析常袞来闽以前福建极少进士及第者的原因和唐末科举的兴盛情况,以期对福建早期的文化开发有较明确的认识。

一

凡是涉及唐代福建文化教育的论著,必然要引述《新唐书·常袞传》中的一段记载:建中元年,常袞任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袞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钩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关于常袞在福州兴学这件事,《新唐书·欧阳詹传》也有类似记载:“及常袞罢宰相为观察使,始择县乡秀民能文辞者,与为宾主钩礼,观游飨集必与,”而后欧阳詹举进士及第,“闽人第进士,自詹始。”对于福建进士始于欧阳詹的说法,前人已多所辨正。而对建中以前“闽人未知学”的说法,许多论者广为引用,似乎已成定论。实际上,只要全面地查阅有关典籍和认真地加以分析,便可知道所谓建中元年常袞来福建之前“闽人未知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当时史传作者对常袞的赞扬心理和未暇深考史实而造成的错误说法。

其实,在建中以前闽人并非都是不知学问的蛮民。即以欧阳詹来说,早在常袞来闽之前不仅善于作文,而且已准备应进士科举。据欧阳詹《与王式书》回忆说,当他二十一岁时,王式等人“予以进士之目”,因考虑尚不胜任,又与同乡人罗山甫隐居山寺,勤勤恳恳读了三年书,遂解送赴京参加省试^①。曾经当过福建观察使且为欧阳詹亲戚的李贻孙,在《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中也说:欧阳詹因为“操笔属词,其言秀而多思”,“由是振发于乡里之间。建中贞元时,文词崛起,遂大振耀,欧闽之乡,不知有他人也。会故相常袞来为福之观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颇嗜诱进后生,推拔于寒素中”^②。欧阳詹青少年时除与王式、罗山甫一起攻读以外,还与林藻、林蕴等文士一起备考过。因此,所谓建中以前“闽人未知学”的说法不符合史实。

在常袞来福建之前不久,就有一次相当著名的兴学活动,即李椅的福州兴学。《唐语林》卷4《企羡》说:“闽自贞元以前,未有进士。观察使李椅始建庠序,请独孤常州及为《新学记》云:‘纓胡之纓,化为青衿’。林藻弟蕴与欧阳詹睹之叹息,相与结誓,继登科第”。按李椅当为李椅。关于此次兴学的详情,独孤及在《毗陵集》卷9《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一文中记载得甚为清楚。李椅为唐朝宗室,曾任御史、尚书郎等要职,大历七年(772)

冬十一月任御史大夫持节都督福、建、泉、漳、汀五州军事领观察处置都团练等使，次年夏四月抵达福建上任。李椅一到福州，便将兴修学校作为首要政事，他以身作则削减官厨食堂的膳食经费，并将“赎刑之余羨”作为营造经费。李椅在福建的时间近三年，于大历十年秋九月死于任上。他在任期间，“以五经训民，考教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李椅此次兴学对福建的文化教育发展影响很大，经过他尽力办学之后，“由是海滨之人，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因此，独孤及在《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最后赞颂道：“公之移风，经始频宫，百堵皆兴，孔堂崇崇……比屋为儒，俊选如林。纓胡之纓，化为青衿。”既然在大历时已有“比屋为儒”之称，可见常袞建中元年来时“闽人未知学”乃凿空之论。关于常袞兴学和李椅兴学之间的关系，《福建通志》中的《福建学校志》卷1倒是记载得简洁明确：福州府学，“唐大历间观察使李椅移建于此，独孤及有《都督府儒学记》。常袞继之，贞元元和间，学者益盛。”

那么，在李椅来福建之前，这里的文化教育状况又如何呢？独孤及也说：“闽中无儒家流，成公〔按：李椅谥号〕至而俗易。”似乎在李椅来闽之前，福建真是无人习儒，民不知学了。笔者认为，这又未必然。事实上，在李椅兴学之前，闽中也并非没有人修习儒家经学，并非没有学校存在。独孤及在同一碑铭中说：“初，成公始至也，未及下车，礼先圣先师。退而叹堂室湫狭，教学荒坠，惧鼓篋之道寝，子衿之诗作。我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栋宇、盛其俎豆。”这说明福州在李椅来之前，已存在着孔庙、学校，只是教室位置低洼、规模较小而已。经过安史之乱的动荡以后，学校的教学也处于荒废状态，因而李椅极力加以振兴。唐代州县学的教学内容为儒家经学，当时福建既有学校存在，因此也不能笼统说李椅来福建之前“闽中无儒家流”。

从中宗神龙二年（706）长溪（今福安）人薛令之进士及第的史实，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当时闽中已有儒家者流，且有相当的教育科举活动。此外，陈元光父子漳州办学也说明唐前期福建存有儒家经学校。陈元光率部平定闽粤间“蛮苗”暴动之后，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上奏《请建州县表》，指出当地民众不易治理是因为“职方久废，学校不兴”，他将兴办学校与创建州政府列为同等重要的两件事。垂拱二年十二月，正式割泉州西南地境置漳州，陈元光任漳州刺史，在《漳州刺史谢表》中，他表示要“重修前志”，“当恪守诏条，征庸俊×”^③。据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2云：陈元光子陈珣曾科举及第，“武后称制，上疏乞归养，使主漳州文学。龙溪尹席宏聘主乡校，乃辟书院于松洲，与士民论说典礼。是时，州治初建，俗固陋，珣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开元二十五年，乞休，复寻松州别业，聚徒教授。”州县学博士又称文学，按此记载，陈珣在任漳州刺史之前曾当过州学博士。同治《福建通志》卷64云：“松洲书院在（漳州府）二十四都，唐陈珣与士民讲学处。今废。”地方志记载唐代情况不可全信，然揆诸情理，在漳州建制后设州学也是顺理成章的。

从以上论述可知，不仅建中元年以前闽人已知学，而且大历以前闽中也并非无人知晓儒学，甚至在唐前期福州、漳州等地已有兴学之举了。只是在贞元以前，福建极少进士及第者。常袞来闽兴学之后，福建进士及第者才增多起来，福建的教育与科举活动进入一个活跃阶段。

参加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人文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中举及第人数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标。唐中宗神龙二年(706)长溪人薛令之进士及第,成为开闽进士。但他在长安任左补阙兼太子侍讲一段时间以后,便因故返回家乡,直至去世。薛令之及第后一直到贞元中八十余年之间,福建再也无人中过进士。常袞来福建之后,改变了这种状况,并出现了欧阳詹那样连中原人也刮目相看、挤进“龙虎榜”的著名进士。

薛令之及第、任职、回乡后默默无闻,以至韩愈等中唐人不知他是福建第一个进士,而认为“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④。韩愈距薛令之及第时间久远且与欧阳詹同榜登第、欧阳詹影响远比薛令之大,因而韩愈在《欧阳生哀辞》中误以为闽中进士由詹始尚不足为怪。奇怪的是身为福建人的欧阳詹自己也一点未提到有薛令之及第这回事,在其文集中看不到有任何此方面的痕迹。按理,同样是远离家乡北上赴进士举的福建人对早先的及第者应有所了解,但就连黄滔这位唐代福建著名进士,也说林藻“贞元七年首闽越之科第”^⑤。这说明尽管唐中宗时薛令之已及第,但影响不大且福建此后太久没有接续中进士者,以至薛令之这位唐前期闽中绝无仅有的进士至中唐时已鲜为人知了。

贞元以后,福建一改过去与进士几乎绝缘的落后局面,及第者络绎不绝。欧阳詹不仅不是闽中第一个进士,而且也不是第二个进士,唐后期福建第一个中进士者为贞元七年(791)及第的莆田人林藻,比欧阳詹早了一年。林藻曾和林蕴、欧阳詹一起隐居山寺学习备考^⑥,据说其省试《珠环合浦赋》中的数句非常精彩,有如神授,因而擅名于时。紧接林藻之后,晋江人欧阳詹与中原的韩愈、李观、李绹,崔群、王涯、冯宿等一代名人同年及第,成为陆贽所取“龙虎榜”中的一员,声名鹊起。德宗朝另外还有陈诩、邵楚苌、陈通方、许稷等四名闽人进士及第,此后从宪宗朝直至唐末,除穆宗朝以外,各朝皆不乏闽中进士,尤其是在昭宗朝有黄滔等十余名进士,出现福建进士及第的高潮时期。据说文宗开成三年(838)闽中有萧膺等四人登第,朝士诗云:“几人天上争仙桂,一岁江南折四枝”,闽中自是号为“文儒之乡”^⑦。

为什么常袞来闽之前福建绝少进士及第者,而贞元以后却络绎于途?

是否因为当时福建民智未开、人文程度低下?关于中唐时福建民风和经济文化开发水平有两种互为矛盾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福建民俗剽悍原始,刘禹锡说:“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⑧,独孤及说:“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馑”^⑨,又说“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余善之遗俗,号为难治”^⑩。独孤及既说闽中经济落后,“岁比饥馑”,又说“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有点自相矛盾,但不管怎么说都认为闽中风俗剽悍,难以绥化治理。另一种说法与此相反,认为闽中人文程度颇高;杜佑指出:“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閻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⑪。这就是说,自从西晋永嘉之乱后,在福建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时,有不少衣冠士人寓居福建,提高了此地的人文素质,流风所被,直至中唐时人们的文化水平还不低,以至於一般民众都会吟咏诗文。笔者认为,建中贞元以前,闽中人文水平既没有杜佑所描写的那么高,也没有刘禹锡、独孤及所描写的那么低。与中原发达地区相比,福建当时经济文化还是相对落后的,但决非目不识丁,未知学问。如前所述,此前已存在过学校,也曾

有过一个珍贵的进士及第者，科举天荒早已破开。

既然建中贞元以前闽人已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常袞来前福建进士会如此之少？除了当时闽中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地理位置远离京师等因素之外，还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安土重迁、不急进取的封闭心态。

薛令之当了一段左补阙兼太子侍讲之后，觉得此职清淡冷落，便题诗于壁上（唐人多有题壁之风）：“明月夜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缩，羹稀筋易宽。只可谋朝夕，那能度岁寒？”唐玄宗幸东宫时见诗，索笔题诗其旁曰：“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谢病东归。此事《唐诗纪事》、《太平广记》引《闽中名仕传》、《唐摭言》等诸书皆载。《唐诗纪事》卷20《薛令之》条还说 he 弃官时“徒步归乡里”，至肃宗即位，以旧恩诏征之，而令之已卒。闽中第一位进士就这样从仕途上退下，在家乡寂然而逝。

唐前期福建不少官员不必到中央吏部铨选注拟，而在当地由选补使以南选办法补充任用^②。欧阳詹世居闽越，其父祖先辈皆为本州州佐、县令，便是南选补充的。韩愈《欧阳生哀辞》说：“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③。《新唐书·欧阳詹传》采用了韩文，并指明闽人“虽能通文书吏事，不肯北宦”。可见中唐以前闽人乐于南选在本地当官，不愿离乡背井上京城名利场去竞争角逐。福建偏于东南一隅，地形多山，而山势使人隔，水势使人合，这种地理环境也造成了闽人安于本土，不愿积极进取的封闭心态。加上福建与中原交通不便，也是造成闽人不肯北宦的原因之一。欧阳詹发解赴长安参加省试时，家人亲友前来送行，“慈亲呜咽数声，声堪断肠褫魄”^④。当时欧阳詹自己的感受是：“天长地阔多歧路，身即飞蓬共水萍。匹马将驱岂容易，弟兄亲故满离亭”^⑤。路上车马行程数月，欧阳詹才抵达长安，可见旅途艰难情形。

其二，闽中举子多为孤单寒俊之士，常袞来福建之前无名人力荐，因而难以及进士第。

福建在林藻、欧阳詹之前八十多年间无人中进士，这还不仅仅是拔解举人太少或水平不够的问题。唐代进士考试不糊名评卷，要中进士往往还要有名声，而此名声常需公卿大臣加以宣扬，并向主司通榜公荐才能起作用。福建当时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唐以前又甚少名臣来此经历仕宦，因而难得有朝廷重臣为闽中举子推荐延誉。即使象欧阳詹那样的闽中世代官家子弟，到长安也只是一个孤单贫寒的举子。他在应进士试时《上郑相公书》中说：“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逾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睥之旧，犹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经过五年的拼搏，进士及第后犹着褐衣，仅获出身，为求入仕他又去应博学宏辞科考试，以求早日释褐^⑥，于考试前仍是困穷潦倒，为还欠债，他以仅有的一驴一马作为抵押，以至如丧手足无法出门，只好“遍祈于人”，以求匹帛斗粟度日。福建人在京都繁华之地如此贫寒，要结交公卿主司谈何容易。欧阳詹在贞元时尚且如此，在这之前又更遑论其他孤单的闽中举人。此外，在唐前期闽中极少进士还因为当时重生徒而轻乡贡，而中央国子、太学生徒入学资格多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仅四门学收有一些各地考上的俊士，在进士录取多为生徒的情况下^⑦，福建少有够格进入中央国子监的品官子弟，自然少有进士及第者。当然，归根结底，进士稀少还是因为中唐以前闽中经济文化相对而言较为落后。

常袞为唐代名臣,在代宗朝作过宰相。他自己是进士出身,执政后着意引拔文士,而尤排摈非文辞登科第者。常袞一贯赏识文章之士,建中元年任职福建后,注重诱进后生文士,“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袞亲与之为客主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詹于时独秀出,袞加敬爱,诸生皆推服”^⑩。由于常袞为之激扬声价,因此欧阳詹受其赏识和鼓励,诗文作得愈发优美,知名度迅速提高。连韩愈在与欧阳詹相识之前就知其名。在常袞的推荐激励下,欧阳詹提高了自信心,也敢于求知己,向一些名公先达自荐,并坚持不懈地参加礼部考试,终于如愿及第,成为唐代福建最著名的进士。

先前闽中举子投师无门,不太懂得如何造请权要打通关节的科举学问,但自从贞元中林藻、欧阳詹进士及第以后,看来闽人也相当知晓与先达往还、激扬声价的学问了。《登科记考》卷15引《闽川名士传》载:许稷从闽中挟策入关参加进士考试,遇同乡舍人陈翊、四门助教欧阳詹、校书郎邵楚苌、侍御林藻。“在京师,闽川举子醢酒食,国诸先达。詹以稷为乡人亲故,特与之。”从此记载中可知林藻、欧阳詹等中唐首批闽人及第者,颇注意与达官先辈往还,并在京师举行酒会,使闽川举子有机会和先达相识。有同乡先进递相接引,闽中举子自然更有赴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决心,孜孜不倦于贡院追求功名。

唐代闽人科举活动和仕途宦风转变为积极北上投考入仕还有一关键因素,即南选的取消。贞元十二年十一月,敕停福建选补司,规定泉、建、福州官吏都要赴首都长安依选例称补。至开成五年(840)七月,漳州、汀州也停南选^⑪。福建南选的停废既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当地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赴京举人增多的结果,也是贞元以后闽人竞相赴京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想在中央吏部顺利铨选入仕,有科第出身尚且不易,没科第出身就更加困难了。在这多种因素的促使下,唐后期闽人一改不肯北宦的风气,纷纷不远千里投奔长安参加举选。福建人也逐渐从安土重迁、不急仕进的封闭心态,变成积极进取、志存高远的开放态势。欧阳詹当四门助教并不满足,向执政要求调动工作,并说:“不仕则已,仕则冀就高衢远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后代,播美于当时,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络朝夕也”^⑫。

中唐以后,许多闽人北上考试,逐鹿中原。会昌三年进士闽中林滋还曾作《文战赋》将科场比作战场。然而,和各地区一样,福建进士及第者毕竟只是众多举子中的极少数,大多数人是败于科场,抱恨终身。欧阳詹之孙欧阳灏娶妇新婚才经旬,便毅然辞家赴举,在长安多年抗节不还,曾作诗云:“黄菊离家十四年”,又云:“落日望乡处,何人知客情?”欧阳灏文词虽为朝贤称叹,然终未及第^⑬。莆田一邑自贞元年间林藻、许稷及第后,有八十七年无人中进士,其间许多文学之士如陈黯、林郁等“俱以梦笔之词,籀金之学,半生随计,没齿衔冤”,以至后来黄滔一再为他们鸣冤叫屈^⑭。到僖宗光启二年(886)陈峤及第才再度为莆邑后人开路,昭宗朝黄璞、徐寅、黄滔等数人又及进士第。唐末,全闽进士及第的比例迅速增加。

“闽越之江山奇秀,土风深厚”^⑮,唐末福建又远离中原动乱地区,社会较为安宁,因而许多士人都流寓福建,也促进了闽中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杜牧曾说:“东闽、两越,宦游盖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⑯,唐末中原著名文人韩偓、罗隐、周朴等都曾寓居闽中^⑰。王审知据有全闽后,黄滔常为其出谋划策,多所规谏,而黄滔“蕴籍文采,为时推重”,因此一批进士出身的中朝士大夫“莫不浮荆襄吴楚交集于闽,特御史为宗主,皆曰:‘安莫安

尔闽者此也’”^②。福建逐渐成为人文荟萃的文儒之乡。五代十国时，王审知还于福州置四门学，以招徕培育四方之秀士。总之，经过唐代的几次兴学活动，特别是中唐以后科举活动的增加，对民间教育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使闽中人文水平日渐升高，为后来福建变成全国科举的重要省份，为宋代以后文化教育繁盛局面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注：

- ①《欧阳行周文集》卷8。
- ②《全唐文》卷544。
- ③《全唐文》卷164。
- ④《唐摭言》卷15《闽中进士》。
- ⑤《莆阳黄御史集·祭陈侍御(峤)》。
- ⑥《莆阳黄御史集·莆山灵岩寺碑铭(并序)》。
- ⑦《福建通志·福建文苑传》卷1引《八闽通志》。
- ⑧《刘禹锡集》卷3《唐故福建都团练观察使薛公神道碑》。
- ⑨《毗陵集》卷14《送王判官赴福州序》。
- ⑩《毗陵集》卷9《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
- ⑪《通典》卷182《州郡典》12《古扬州下》。
- ⑫参阅拙文《唐后期铨选制度的演进》，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1期。
- ⑬⑭《韩昌黎文集校注》卷5。

- ⑮《欧阳行周文集》卷8《与王式书》。
- ⑯《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六函一册，欧阳詹《泉州赴上都留别舍弟及故人》。
- ⑰参阅拙著《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第5章《唐代的科举出身与铨选入仕》，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6月。
- ⑱参阅拙文《唐代学校与科举的消长》，载《高等教育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
- ⑲《唐会要》卷75《南选》。
- ⑳《欧阳行周文集》卷8《上郑相公书》。
- ㉑《云溪友议》卷下《巢燕词》。
- ㉒《唐黄御史公集》卷6《司直陈公墓志铭》。
- ㉓《莆阳黄御史集·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
- ㉔《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 ㉕嘉庆《惠安县志》卷30《隐逸·寓贤》。
- ㉖《莆阳黄御史集》所载《丈六金身碑》及附录吴源《蒲阳名公事迹》。

(上接第64页)

秦汉近海航运的发展是与陆路交通的发展相联系的，这一发展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帝国的形成和巩固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为远洋交通的开拓奠定了基础。

注：

- ①《史记·封禅书》记载，是年还长安后，作建章宫，前殿“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也体现出对海上神山传说的沉迷。
- ②汉武帝时代由会稽发兵南下凡三次：即建元三年、六年和元鼎六年。其中1、3二次史籍明确记载经由海路。第2次很可能亦泛海南下。
- ③据《史记》记述楼船载兵有限，然而其进军速度，则显然优于陆军。
- ④黄盛璋先生在《中国港市之发展》一文中考证，“汉征朝鲜从莱州湾入海，地点或在东莱。”
- ⑤《汉书·地理志下》乐浪郡属县有“洺口”。
- ⑥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割乐浪郡南部为带方郡。
- ⑦卢弼《三国志集解》：“钱大昭曰：‘东县’当作‘东

治’。”

- ⑧事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和金琮传。
- ⑨有一种意见认为，孙权的意图，是要在夷洲、亶洲建立孙吴的统治，卫温、诸葛直因水土不服，疾疫流行，被迫返回，因而以“违诏”处死。然而据陆逊、全琮对此役前景似乎是谋取短期经济收益。赤乌二年(公元239年)至辽东“虏得男女”(《吴主传》)，此次“得夷洲数千人还”，都说明海外经营的目的主要在于开发人力资源。
- ⑩《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朱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
- ⑪《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珠崖、儋耳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张晏曰：“珠崖，言珠若崖矣。”